

# 《春风沉醉的晚上》的空间叙事研究

□ 马懂瑞

**【摘要】**《春风沉醉的晚上》写于1923年，虽然延续了郁达夫一贯忧郁苦闷的风格，但蕴含着希望的光芒与人文关怀。作者的目光从知识分子延伸至工人阶级，小说通过邓脱路贫民窟、街道、工厂等场景的空间转换，以空间为线索推动叙事发展，展现了当时上海与“我”和女工陈二妹同样贫苦的人们生活状况。从空间视角来看，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的多重叙事对人物形象塑造和小说主题深化具有重要作用，值得深入探究。

**【关键词】**郁达夫 《春风沉醉的晚上》 空间叙事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2881 (2025) 20-0007-04

对于《春风沉醉的晚上》，许子东说：“作品的主题，与其说是明确的‘社会主义思想’，不如说是复杂的感叹，感叹‘现代寒士’的‘我’（知识分子）与烟厂女工之间的异和同。”<sup>[1]</sup>从空间叙事的角度解读这部小说，与这个观点不谋而合。小说讲述了落魄知识分子“我”和女工陈二妹因同住贫民窟碰巧成为好朋友，两个贫苦的人在动荡的时代互相安慰与鼓励的故事。从空间视角出发，可以观察到不一样的叙事进程。从“我”和二妹生活的物质空间，到人际交往的社会空间，再到内心复杂的心理空间，这种多层次空间的交织，生动展现了时代的苦难和个体的生存状态，特别是对工厂空间的间接叙述，体现了作者对无产阶级的关注。“我”与二妹之间的友谊与理解，成为小说情感表达的重要部分。这种跨阶层的交流与人物对比，展现了郁达夫对个体命运的关注，以及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呼唤。

## 一、物质空间

### 1. 狭小且破败不堪的贫民窟

《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物质空间的变换是推动故事发展的主要线索。小说开篇描写了“我”在上海的三次住所变动：静安寺监房—跑马厅栈房—邓脱路贫民窟。表面看是地理位置的变换，实则体现人物生活环境与氛围的转变。因此，分

析物质空间的细节有助于全面了解人物形象，也能洞察作者的创作意图。

每个人的房屋本应是私密空间，但小说中的“我”连这点隐私都无法拥有，因为房东将楼层隔成两间，外间住客必须经过“我”的房间出入。“邓脱路的这几排房子，从地上量到屋顶，只有一丈几尺高。我住的楼上的那间房间，更是矮小得不堪。”<sup>[2]</sup>贫民窟的房屋不仅矮小破败，连楼梯都是用破铜烂铁搭建的梯子替代。“用了这张梯子往上面的黑黝黝的一个二尺宽的洞里一接，即能走上楼去。”<sup>[2]</sup>小说用“矮小”“黑沉沉”“猫额那样大”等词概括了主人公“我”的居住环境。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家具不得不一物多用，白天的书桌晚上就当床。小说中出现的家具并非偶然，“家具陈列于建筑物中，具有这样一些暗含之义：它似乎就是一件便携式的小型建筑作品……电影制作人和小说家尤其擅长利用这一点，即通过描述人物居住的环境来展示人物的性格特点”<sup>[3]</sup>。“我”的房间只有画架和用旧书堆成的桌子，生存的拮据状况一目了然。二妹的房间里只有床、半桌、板箱、圆凳，虽然清贫却干净整洁。不同的家具展现了人物不同的生存状况与性格特点，二妹的整洁与贫民窟的脏乱形成鲜明对比。贫民窟是“我”和二妹共同的物质空间，而家具作为大空间中的小空间，展现了人物间的

**作者简介：**马懂瑞，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细微差别。

上海租界与贫民窟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物质空间，构成了叙事空间的第一层和第二层。它们不仅为故事提供了具体场景，更深刻隐喻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狭小破败的贫民窟仿佛是时代的阴影，笼罩着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这里的房屋低矮阴暗潮湿，街道狭窄肮脏，空气中弥漫着贫穷与绝望的气息。人们为了生存奔波劳碌，却难以摆脱贫困的枷锁。“我”作为小说主人公，生活在这个贫民窟中，命运与这个时代紧密相连。

## 2. 工具性空间的工厂

正如列斐伏尔在《空间与政治》中所说：“资本主义是通过对空间加以征服和整合来维持的。很长时间以来，空间都不再是一个被动的地理学的中心，或者一个空洞的几何学的中心。它变成了工具性的。”<sup>[4]</sup>这里的工厂正是资本家统治无数像二妹这样的工人的工具性空间，因此二妹对这里充满怨恨。她每天起早贪黑地辛苦工作，所得报酬却难以维持生计，这正是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与压迫。工厂是资产阶级的工具性空间，而工人又何尝不是资本家牟利的工具？对二妹而言，除了贫民窟，最重要的物质空间就是工厂，这既是她谋生的手段，也成为阻碍她人生发展的沉重负担。工厂更展现了空间与权力的关系，正如福柯所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sup>[5]</sup>空间场所的存在促进了权力的扩张，权力的空间化有效地保障了权力的运作。在这部作品中，工厂空间作为重要的间接叙述元素，扮演着关键角色。工厂不仅是工人劳动的场所，更是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特定的物质空间里，工人们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单调繁重的工作，身心承受着巨大压力。郁达夫通过对这一空间的间接描写，表达了对无产阶级的深切同情与关注，展现了他对社会底层人民命运的关怀。

## 二、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

### 1. 穷困潦倒与物质社会的冲突

“只有当社会关系在空间中得以表达时，这

些关系才能够存在：它们把自身投射到空间中，在空间中固化，在此过程中也就生产了空间本身。”<sup>[6]</sup>由于“我”经常宅在家里，社会关系主要产生于街道，无论是购买生活用品还是去邮局取汇票都需要走上街头。街道作为公共空间，任何人都可以使用。正如汪民安所说：“人人都可以随时踏上街头，但人人都怀揣着隐秘的目的。街道就是这样一个宽容的器皿，是一个不需要门票就将任何人盛装起来的慷慨而巨大的器皿。”<sup>[7]</sup>然而，即便是这样平等的公共空间，“我”仍与物质社会产生了冲突。

随着气温升高，贫民窟污浊的空气加剧了“我”的神经衰弱症状，因此“我”常在夜间外出散步。春风沉醉的时刻是“我”难得的自由时光，“一个人在马路中从狭隘的深蓝天空里看看群星，慢慢地向前行走，一边作些漫无涯埃的空想，倒是于我的身体很有利益。当这样的无可奈何，春风沉醉的晚上，我每要在各处乱走，走到天将明的时候才回家里”<sup>[2]</sup>。无论是身体放松还是思想放空，这样的“春风沉醉的晚上”都成为“我”夜间漫步的最优选择。白天，“我”要去邮局领取翻译小说的汇票，顺便采购生活必需品。与夜间散步不同，白天走在街上首先感受到的是厚重棉衣带来的闷热，其次是因贫穷而产生的自卑心理。然而晚上漫步街头时，“我”甚至会暂时忘却微薄的积蓄和拖欠的房租，这都是街道美景带来的片刻欢愉。作为公共空间，街道与贫民窟的破败截然不同，这里的美好事物给“我”带来希望。但这短暂的美好转眼之间就烟消云散，当“我”横穿马路时，无轨电车司机用上海方言爆出的粗鄙话语如惊雷般击碎了“我”的幻想，提醒着街道上依然存在的阶级差异，一时的美好终究无济于事。在估衣铺询问夹衫价格时，店员的嘲弄更让“我”难堪。这些都是主人公“我”与物质社会的冲突体现，贫穷既是“我”的生存状态，也是冲突的根本原因。

### 2. 挣扎于颓废和情欲之间的觉醒者

人在社会交往中，总会与他人产生交集。这种语言交流往往伴随着个人心理活动的“外显”。

此时,每个人都拥有独特的心理空间。主人公“我”面对女工二妹时内心想法的变化,构成了小说最显著的心理波动。起初,“我”对二妹仅持旁观者心态,虽觉其可怜,却自顾不暇。随着两人日渐熟稔,彼此敞开心扉。在与二妹的交谈中,“我”开始反思自身处境:半年间虽偶有翻译,却浪费了大部分时间。二妹误会“我”夜间散步是在行违法之事,经解释后,两人的友谊更加深厚。此时“我”萌生情欲却努力克制:“你莫再作孽了!你可知道你处的是什么境遇!你想把这纯洁的处女毒杀了吗?恶魔,恶魔,你现在是没有爱人的资格的呀!”<sup>[2]</sup>这种理性克制与郁达夫笔下其他男主人公形成鲜明对比,展现出逐渐觉醒的内心世界。小说通过一段凌乱断续的思想波动,生动展现了主人公复杂的内心冲突:既有对二妹情欲与友谊的矛盾,又有人生理想与现实处境的挣扎。从“我”身上不仅能看到人物自身的改变,更折射出郁达夫创作风格的转变。与《沉沦》相比,《春风沉醉的晚上》虽延续伤感基调,却透出希望之光。“我”与二妹虽生活困顿却不显颓废,彼此激励间,“我”摒弃了自我放逐的念头。这种人物形象的积极转变,标志着郁达夫创作风格的转折。

### 三、空间的叙事功能

#### 1. 空间对人物形象的塑造

“通过在叙事作品中书写一个特定的空间并使之成为人物性格的形象的、具体的表征,则是塑造人物形象的一种新方法——‘空间表征法’。”<sup>[8]</sup>小说中的“我”和二妹正是在相同或不同的空间中展现出人物形象的不同发展轨迹。他们共同生活的空间是贫民窟,而各自活动的空间则是工厂和街道。在贫民窟里,同处困境的二人能够相互倾诉、彼此鼓励。在工厂中,二妹收获的只有疲惫与怨愤;而在夜晚的街道上,“我”却获得了精神的自由。

从贫民窟到白天的街道,再到夜晚的街道,“我”在不同空间中的转换,不仅展现了物理环境的改变,更深层次地反映了“我”内心世界的

起伏与变化。贫民窟作为“我”日常生活的场所,象征着贫困与绝望,这里的每一处都承载着“我”对苦难生活的无奈与抗争。然而,当“我”走出贫民窟,步入白天的街道时,尽管仍能感受到社会的冷漠与不公,但外界的喧嚣与活力却在某种程度上唤醒了“我”内心的斗志与希望。在二妹眼中,“我”是一个失业的知识分子,对待同住者友善而真诚,是个忠厚之人。但所处的社会空间并未给予“我”生活的自由,反而让“我”感到窒息,完全丧失了掌控空间的能力。最终,在夜色笼罩下,“我”独自行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静静思考精神自由的真谛。夜晚的街道,没有了白日的喧嚣与繁忙,却多了几分宁静与神秘。“春风沉醉的晚上”这个充满诗意与梦幻色彩的短语,不仅是小说的标题,更是主人公“我”心中的一片净土,一个新生之地。在这个无拘无束的时空里,“我”仿佛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天地,这里充盈着力量与信念,让“我”得以暂时逃离现实的苦难,体验那份不受羁绊的自由。

#### 2. 空间对小说主题的深化

“春风沉醉的晚上”这一空间意象构成小说叙事的核心,整个故事由此展开。它既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叙事动力,也是串联故事各要素的纽带。故事本质上是跟随“我”散步时的思绪,展开的一场探寻命运、寻求答案的心灵旅程。通过标题与内容的呼应,“春风沉醉的晚上”所蕴含的空间特质投射到小说的整体架构中,形成独特的空间隐喻。“我”在春风沉醉的夜晚漫步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寻找生存空间、追求自我认同的过程。

小说通过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的三重建构,以细腻的情感描写和深刻的社会洞察,为读者呈现出一个多维度的文本空间。

从私人空间来看,首先是静安寺路南的监房,这里被描述为“自由的监房”,虽名为自由,实则暗示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困境。鸟笼般的空间形态以及周围凶恶的裁缝或可怜的无名文士等住民,体现出主人公虽身处繁华都市,却过着贫穷、困窘且孤独的生活,为后文展现社会对底层知识

分子的压迫这一主题做了铺垫。其次是短暂出现的跑马厅栈房，这一空间反映出主人公生活的不稳定和艰难，暗示社会环境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强化了社会现实压迫下人物生存困境的主题。最后是贫民窟，其拥挤和黑暗的特点深刻体现了底层人民的极度贫困，凸显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和不公，有力地支撑了小说的社会批判主题，让读者更能体会主人公及陈二妹等底层人物所承受的苦难。

从公共空间来看，首先是街道。“我”白天因取信上街，街上的繁华富丽与鼎沸人声，与自身的贫困潦倒和孤独形成鲜明对比，突出了“我”在城市中的边缘地位和内心落寞，也反映了社会的阶层分化和不公，丰富了小说的社会批判内涵。其次是估衣铺，“我”为置办衣物，从美租界住所辗转到英租界五马路的估衣铺，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经济困窘——偌大的美租界竟买不到价格合适的衣物，还暗示了城市商业布局与底层人民生活脱节，进一步揭示了社会的不合理性，强化了主题。

文章的末尾有这样一段描写：“天上罩满了灰白的薄云，同腐烂的尸体似的沉沉地盖在那里。云层破处也能看得出一点两点星来，但星的近处，黝黝看得出来的天色，好像有无限的哀愁蕴藏着的样子。”<sup>[2]</sup>这段话寓意深远。社会环境虽然如同厚重的云层般压抑沉闷，但总会有星光穿透云层。当时的中国有无数苦闷彷徨的青年，但总会有觉醒者引领他们冲破黑暗，走向光明。这样的意象引发读者对自我价值实现的思考。云层之上的空间或许就是郁达夫笔下乌托邦般的理想空间，当作品中的人物逐渐战胜自我、获得新生时，或许也预示着苦难的中国终将迎来光明的未来。这就是郁达夫构建的文学叙事空间，“总之，这是一个以人为核心、起点与终点的想象性空间，是意义的生发与流动”<sup>[9]</sup>。

#### 四、结语

“文学作为人类生存境遇的文化表征，任何时候都离不开对生存问题的关怀，缺少对生存境

遇的深切关怀维度，文学的内在价值与意义必然丧失殆尽。”<sup>[10]</sup>如果说文学是郁达夫抒发人文关怀的媒介，那么空间则为他提供了想象的场域。人物的生存境遇在空间中展开，从贫民窟到工厂，从街道到洋楼，失业知识分子“我”与女工二妹的生存状态在日常空间中逐渐呈现。《春风沉醉的晚上》构建了一个多层次的空间结构，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相互交织融合，展现了生存与理想的冲突、情欲与良知的博弈。这种独特的空间叙事艺术值得读者细细品读，以发掘文本背后的深层意蕴。

#### 参考文献

- [1] 许子东. 郁达夫新论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 [2] 郁达夫. 春风沉醉的晚上 [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6.
- [3] 巴兰坦. 建筑与文化 [M]. 王贵祥, 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7.
- [4] 列斐伏尔. 空间与政治 [M]. 李春,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 [5] 包亚明. 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 [6] 包亚明. 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 [7] 汪民安. 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 [8] 龙迪勇. 空间在叙事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J]. 江西社会科学, 2011 (8).
- [9] 方英. 理解空间: 文学空间叙事研究的前提 [J]. 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2).
- [10] 谢纳. 空间生产与文化表征——空间转向视阈中的文学研究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责任编辑 余 柳)